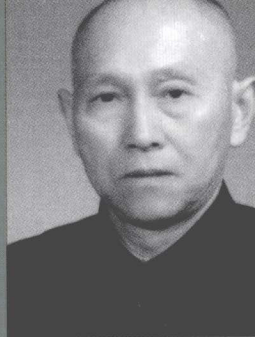


北大中文文库

游国恩文选

尝谓居今日而言《楚辞》，其要有五：一曰校其文，二曰明其例，三曰通其训，四曰考其事，五曰定其音。

游国恩 著 / 傅刚 常森 编选



游国恩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中文文库

游国恩文选

游国恩 著 / 傅刚 常森 编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国恩文选/游国恩著;傅刚,常森编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0

(北大中文文库)

ISBN 978-7-301-17884-3

I. ①游… II. ①游… ②傅… ③常…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
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2176 号

书 名: 游国恩文选

著作责任者: 游国恩 著 傅刚 常森 编选

责任编辑: 徐丹丽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884-3/I · 226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7.75 印张 256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十五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

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的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陈平原

2010年3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前 言

游国恩先生(1899—1978),字泽承,江西省临川县(现改市)带湖村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自1929年起,先后在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大学等校任讲师、教授。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1942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中文系副主任,兼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55年被评为一级教授。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78年6月23日在北京病逝。^①

游先生是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家和楚辞研究专家,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为高校教材,长期以来都是高等院校的主要教材,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他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影响至今不衰。他的楚辞学成果主要有《楚辞概论》(北新书局1926年版)、《读骚论微初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楚辞论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天问纂义》(中华书局1982年版)。由游宝谅先生编辑的四卷《游国恩楚辞论著集》,129万字,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他的著作还有《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中国文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游国恩大理文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作为楚辞研究家,综合评价游先生的研究成就,可以说他是古典楚辞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现代楚辞学的奠基人。

这一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自然是其《楚辞讲疏长编》(出版时改称《楚辞注疏长编》)。1924年以来,游先生十余年潜心研读楚辞典籍,

^① 游宝谅先生有《游国恩先生年谱》一文,刊载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可资参考。

于1933年撰成《楚辞讲疏长编序》^①，讲述自己研读《楚辞》心得及大规模整理和研究《楚辞》的计划：

余自甲子（按即1924年）以来，究心《楚辞》十余年，于前贤笺注与夫有关斯学之书，粗有涉猎。尝谓居今日而言《楚辞》，其要有五：一曰校其文，二曰明其例，三曰通其训，四曰考其事，五曰定其音。……余独怪昔人好说《楚辞》，其书殆不下数十百种，大率习旧安常，浅薄固陋；往复其言，互为奴主，而多不肯深致其功。间有专心壹志，勤求骚人之旨者，则寥寥稀见。窃不自揆，妄欲网罗众说，考核群言，钩稽参校，时出鄙见，为《楚辞笺证》十七卷，《考证》、《正均》、《考异》、《论文》各若干卷，《楚辞学考》、《楚辞笺注书目提要》各一卷（附历代亡佚及知见传本楚辞书目），凡三十九卷。人事拘牵，时作时辍，未知成书当在何日。忆昔乙丑（按为1925年）之夏，成《楚辞概论》六篇，于古今聚讼之端多所论列。虽其考据发明，时有新义，及今观之，谬误固已多矣。迨者教读之暇，复刺取昔所未见，及其有关是书者，悉为抄录，得数百条。其偶有弋获，辄笔之简端。三四年来，凡《楚辞》、《文选》之书，及古今杂考杂说评文之类，搜集丛残，得百数十种。其间得失杂陈，精粗互见，要以博文多识，避固陋，观会通而已。由是爽然自失，觉前此所涉之未广，宜其多悔而获尤。且以深慨夫《楚辞》之文窈而深，其旨曲而婉，断非率意浅尝所能窥其万一也。于是区其条理，荟为成编；复采王逸以下众家之说，先就屈子诸赋逐条而系之，末加按语，颇出鄙意，题曰《楚辞注疏长编》，既以为学子佔毕之助，且备他日抉择之资；盖兹编之成，特椎轮积水之类耳。^②

中经八年抗战等诸多事项之干扰，至1978年6月，《长编》第一编《离

① 该序收录于《读骚论微初集》，1980年《离骚纂义》作为《长编》第一编出版时，作为总序，被置于卷首。

② 游国恩《总叙》，《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按：“《楚辞注疏长编》”原作“《楚辞讲疏长编》”，中华书局《论著集》殆据其出版时之名改为“《楚辞注疏长编》”。

骚纂义》及第二编《天问纂义》即将完成,而游先生不幸遽尔逝世^①。

罗庸评价游先生楚辞研究,谓《长编》度越前贤,有八善可陈,其言曰:

《楚辞纂义·离骚》、《天问》各一卷,吾友临川游泽承教授之所著也。泽承与愚同学于国立北京大学,而年次不相及。自其早岁,即殚心于屈、宋之学。尝为《楚辞概论》一书,于屈赋考辨多所创获。既卒业,教授于河涉江汉间各大学者垂二十年,庚治旧学,锲而不舍,复刊为《读骚论微初集》,见者固已惊其河汉矣。东夷乱作,播迁苍山洱海间。既移讲席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遂得重聚于昆明。相悲问年,俱成老大。荒村藜糝,拥褐论文。复出其旧著所题《楚辞训纂》者若干卷,摘其《离骚》《天问》两卷,增补校理,更题曰《楚辞纂义》,将付剞劂,就愚商略,且索一言。

愚维《楚辞》之学,二千年来盖经三变:自淮南作《传》,迄于叔师《章句》,汉人旧学遂成定论。下逮隋唐,无或致疑。迨考亭《集注》出,乃始批翦榛芜,独标旨趣。此一变也。宋明学者,竞探微言,末流空疏,浸成臆解。迨东原《屈赋注》出,乃始综核故训,屏绝虚浮。此再变也。清儒致精朴学,其于名物训故考辨极详,而大义疏通转多不逮。迨近三十年,乃有致疑于屈、宋之行实,篇章之真伪者,使相承旧说皆得平列几筵,重新审订。此三变也。大抵尊王者失之墨守,宗朱者转为空疏,衍戴者流为烦碎,而近人之论,破多立少,求其弥纶群议,详慎折中,则概乎其未有闻也。《楚辞》旧注采摭详备者,在昔惟蒋氏《山带阁注》。然于平章旧义,抉择精微,若犹有憾。泽承此编,承近世学风之变,兼前人累世之长。其于左右采获,巨细靡遗,则远逾蒋氏;别白异论,独抒卓识,则度越考亭;至于校正文字,疏通训故,考订史实,则又东原所未殆焉。

循讽终篇,目穷精义,约而论之,盖有八善足陈:

一曰择善而从。旧学汗漫,彼此抵牾,览者迷茫,莫知所适。

① 编撰此《长编》的具体过程,可参阅费振刚先生《游国恩先生学术成就评述》,刊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今备列众解，而以己见折衷，使是非昭然，瑕瑜不掩。此一善也。

二曰更正脱误。旧解详于考注，而校勘多疏，如《离骚》之“黄昏为期”，《天问》之“河海”、“应龙”，及“薄暮雷电”以下，率皆顛预为说，不察文例。今则识其错简，还厥本真，使文例昭然，通读无碍。此二善也。

三曰校订文字。《离骚》之“替余蕙纁”，《天问》之“到击紃躬”，旧皆不得其解，今校“替”为“晉”，校“到”为“列”，则文意晓然。此三善也。

四曰发明文例。《离骚》“夏康娱以自纵”，旧解皆以为“夏太康”，今通观文例，决知“康娱”连文，旧说自破。《天问》文例旧无解人。今知四句为节，节自为韵，则知“河海”“应龙”与“焉有虬龙”简编之脱错。绳尺既定，物则有归。此四善也。

五曰核正训诂。《天问》一篇，古号难读。今于采摭旧说之余，间申己意，如“负子”之训，“柏林”之解，皆厘然有当，远过前人。此五善也。

六曰综理旧说。“王恒”、“王亥”，始见甲文，观堂著书，群矜创获。今知自柳子厚朱考亭以迄徐位山刘云翼，于注《天问》皆有发明，王氏不过用甲文之新证，足前人之成说。于以明学问积累，非一手一足之烈。此六善也。

七曰创通大义。美人香草，说者不同，《离骚》求女，更多异解。今知屈子以妾道喻臣道，则求女为求通君侧之人，于是通篇大义，豁然理解。此七善也。

八曰不知盖阙。《天问》“干协时舞”，旧说纷然，无一可通。今仍径从盖阙，矜慎之度，足祛狂瞽。此八善也。

综此八善，重以二长：一曰删取严净，二曰文辞安雅。虽旧说之渊海，实新义之留会。此书一出，行见群燭息光，一星独曜。^①

① 罗庸《楚辞纂义叙》，原载《国文月刊》第31、32期合刊，收入《游国恩楚辞论著集》。按：中华《论著集》“替餘蕙纁”，误“余”为“餘”，“‘河海’‘应龙’与‘焉有虬龙’简编之脱错”句，文字和标点亦多有误。

罗氏发掘《长编》之价值甚善，足资参考，然仅此尚不以见其成就。

前人注楚辞，于屈、宋诸子之外，往往有对话的对象。洪兴祖之补注主要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对话对象，朱熹《楚辞集注》主要以王氏章句、洪氏补注为对话对象……朱冀在《离骚辩》中则主要以朱熹、林云铭为对话对象。游先生《长编》采摭王逸以下百数十家之说，断以己意，几乎是以汉代以下一切治楚辞之学者为对话对象，前所未有，后以罕见，故称古典楚辞学之集大成。

然《长编》非“习旧安常”之作，在校文、明例、通训、考事诸方面务求其实，而“勤求骚人之旨”，于过往千百年之旧说，其是者明之，其非者黜之，衡定其价值，常出以己意。故于《离骚》题下，列《史记·屈原列传》以下约二十家之说，论其得失之要，而断“离骚”之义为楚歌“劳商”；于《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之下，列王逸章句以下二十余家之说，论其得失之要，摒弃以求女为求君或求臣之旧说，而断求女乃隐喻“可通君侧之人”。凡此之类，比比皆是。其说固有可商榷者，且由体例所限，难以容纳和安排那些跟屈辞各语并不直接相关的精彩论说（按：古人治楚辞之学，于解释文字、疏通章句之外，常别有精彩考论，如朱熹集注外又有《辩证》，陆时雍《楚辞疏》有《读楚辞语》，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有余论，其间不少内容长编难于采摭），然其扬弃千百年楚辞旧学而开现代楚辞学之格局，则断然无疑。惜乎《长编》原计划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五编，又有校勘、音韵和评论各一编，而其事未竟，迄今只有《离骚纂义》和《天问纂义》出版。

游先生《楚辞概论》、《读骚论微初集》等楚辞学著作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亦于此相通，就不必费辞了。

游先生又是杰出的文学史家。据游先生女儿游宝谅先生说，游先生在大学任教凡五十年，其间开设的课程不下二十多门，而中国文学史则是他自始至终开设的课程。长年的教学和研究，使得他对中国文学史有了深入的理解。他早年有《先秦文学》出版（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但更多的讲稿却没有能够留下来。其中一种以《中国文学史讲义》名，经游宝谅先生整理，2005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推出。游先生对中国文学史写作及教学有长期的思考。1961年，中宣部、高教部联合

召开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成立了教材编选办公室,实施一个大规模的编著文科教材的规划;《中国文学史》被确定为其中一种,游先生和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先生为主编,而任第一主编和编写组召集人。这套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就是按照游先生的思路展开的。该书自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四卷本方式出版后,至2005年四十年间,累计发行200万部以上,至今还在重印,是20世纪初高等院校设立中国文学史课程以来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教材和文学史专著^①。研治古代文学史者几乎无人不读此著,一般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子对此著也毫不陌生,所以这里无必要再作详细评介,而只需指出,虽然该著对中国文学史的很多看法值得商榷,但它奠定——至少是促成了并表征着迄今为止古代文学史书写的基本理念、认识和格局,它可以被修正,被延展,被重施排列与组合,却难以被超越。

在古代文学史方面,游先生作为一代学人之代表,不仅规范了古代文学史书写的整体格局,而且也规范了古代文学史教学的整体格局。——具体的教学方式各式各样,课程设置的教材也五花八门,但其格局无甚变化。游先生对奠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格局的重大作用,不仅体现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和出版上,而且体现在他组织编撰和推出了与之配合使用的作品选注。游先生在北大讲授文学史时,向学生发放配套的作品选注,当时称为“文学史参考资料”;具体编撰,由游先生提出作品选目及注释要求,具体工作则由吴小如先生负责,再经游先生审订。这套参考资料分别于1957年、1959年以《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之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受到普遍欢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新1版,后来中华书局还出过重排版。

这套参考资料选择经典诗文加以注释,附以相关学者或作家之事迹、思想,学术史相关知识,以及后人对作家作品的评论等。迄今为止,文学史参考资料也已经出版了很多,但无有超出这种规模者,往往只是各据所需进行“改制”(当然由于学制定限,收缩势在必然)。故在很多

^① 参阅费振刚先生《游国恩先生学术成就评述》,刊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关于《中国文学史》编撰的具体经过及其提供的重要历史经验,亦可参阅此文。

方面,这套参考资料还是难以企及的。

首先是选文宏富。比如,先秦部分之选文分神话、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尚书》、《诗经》、《左传》、《国语》、《战国策》、《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楚辞》十五部分,有不少方面为后来的同类著作所不及,若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等等。而即便都有涉及者,其视野和范围也远较他书宏阔。其神话部分,选录了《山海经·北山经》之精卫填海,《海外北经》、《大荒北经》之夸父追日,《海外南经》之羽民国,《大荒南经》之张弘国,《海外南经》、《大荒南经》之灌头国,《博物志》之奇肱国,此外又有鲧禹治水神话六则、共工神话四则、黄帝蚩尤神话六则等等;其女娲神话部分,选录了《淮南子·览冥》篇、《太平御览》卷七十八所引《风俗通义》、李冗《独异志》、董勋《问礼俗》当中的相关篇章,后羿神话部分,选录了《山海经·海内经》、《淮南子·本经》篇、《楚辞·天问》中的相关篇章。在选文方面立如此之高标,固有时代因由,却也有对学科建设的全局性的考量。

这套参考资料每一方面的内容,均显示了游先生对古代文学教学整体格局的建构(举凡知识结构、基本能力等)。由阅读选文自可积累古代文学基本典籍的知识,提高古文阅读能力,而由阅读附录,首先可以建立相关的知识系统。比如,该书《尚书》部分附录了“关于《尚书》的源流、真伪”、“关于《尚书》的篇目、体例、名称”等经典材料,分别采摭于《汉书·艺文志》、《伪孔传序》、《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条、《书序》(据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史通·六家》篇等,涵盖了文学史、学术史的诸多重要方面。阅读附录中的历代经典的批评材料,自然有助于提高赏鉴、分析古代诗文的能力。比如《史记》附录之第四部分为“关于《史记》在文学方面的评价”,两汉辞赋附录之第二部分为“关于赋的评论”,都凸显了编撰者对古代文学教、学格局的设计。

总之,两部文学史参考资料具有难以超越的典范意义。惜乎,这套意在配合整个古代文学史的参考资料至今尚未出全,期待有关学者更进努力,使之成为完璧。

游先生主要以楚辞学家、文学史家泽被学林,享誉世界,但其实这

并不能完整地反映游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成就。游先生的学生曹道衡先生说：“游国恩先生以楚辞研究名世，实则他的治学方面极广，举凡先秦诸子以迄近代诗文，除过去所谓‘俗文学’这一部分外，很少有未曾涉足过的领域，而且多有精到的见解。”比如《诗经》研究，游先生对此发表的成果不多，但他对《诗经》的研究却非常精深。曹道衡先生曾回忆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时，制定了以《诗经》研究为特色的计划，为此文学所图书馆也将购藏《诗经》研究方面的书籍，所里派余冠英先生和曹道衡先生专程来北大向游先生请教。游先生用一个下午向他们介绍了四十多部《诗经》研究著作。对各书的内容、特点、版本等等方面，如数家珍，可见游先生对《诗经》了解的深入。又如抗战期间他随华中大学避难云南，就结合当地文史实际情况，创建了“西南边疆文化研究室”，撰写了《火把节考》、《说洱海》、《南诏用汉文字考》、《文献中所见西南民族语言资料》等非常有学术质量的文章。本书亦收入几篇，藉以反映游先生研究的一个侧面。

以游先生为例，我们常常感到前辈学者学养的深厚。前辈学者的学问就像冰山一样，发表出来的成果仅是露在水面上的一角，大部分都深埋在水底下。我们向游先生这样的前代学者学习，不仅了解他们已经发表了成果，更要学习他们如何经之营之的治学态度和对自身学养的积累、提高。游先生的学术视野宏阔，学风平正通达，他植根于乾嘉，又受五四新学风洗礼，故其学术既有旧学根基，又有新学的方法和眼光。游先生一生研究涉及领域广泛，本书所选仅能反映游先生学术成就的一隅，然即此一点，足以窥见游先生高深的学术造诣，亦足以供后学者学习和思考。

傅刚 常森

2010年9月

目 录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陈平原(1)
前 言	傅刚 常森(1)
屈赋考源	(1)
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	(29)
论九歌山川之神	(74)
离骚“后辛菹醢”解	(89)
天问古史证二事	(94)
楚辞女性中心说	(109)
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	(118)
楚辞用夏正说	(129)
楚辞九辩的作者问题	(135)
宋玉大小言赋考	(142)
柏梁台诗考证	(152)
论陌上桑	(174)
论蔡琰胡笳十八拍	(182)
白居易的思想和艺术	(190)
论山谷诗之渊源	(198)
跋洪昇枫江渔父图题词	(205)
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	(210)
居学偶记	(221)
游国恩先生学术年表	陈 莹(263)

屈赋考源

一 赋的小引

什么是“赋”？《毛诗·豳民》“明命使赋”，《传》云：“赋，布也。”又《小旻》“敷于下土”，《传》云：“敷，布也。”“赋”“敷”同声，故《管子·山权数》“赋借藏龟”注亦云：“赋，敷也。”又“敷”与“赋”古并读作重唇音；故诗“敷政优优”，《左传》引作“布政优优”；“敷时绎思”，《左传》又引作“铺时绎思”。其实都是一个意义。（详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五）后来刘勰便根据这个意义下了一个“赋”的界说道：“赋，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同时钟嵘《诗品》也说：“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朱子在《诗集传》也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综观众说，“赋”的意义很简单：用现在新名词来说，不过是修辞学上的“直说法”而已。

《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一曰‘风’，二曰‘赋’。”《毛诗·关雎传》亦云：“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可见“赋”本是六诗的一种。所以班固《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颜氏家训·文章篇》亦云：“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后来这“六诗”的学渐渐的失传了，于是只有“赋”单独盛行起来，这便是刘彦和说的“六义附庸，蔚为大国”。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中有一段话讲他的来历最明白：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贤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师古曰：“风”读曰“讽”），咸有恻隐

古诗之义。

由此可知赋的性质虽主铺张，而他的作用却仍为讽谏，与诗歌初无分别。屈宋以后，如枚、马诸人的赋，虽然变本加厉，“竟为侈丽闳衍之词”，不免“劝百讽一”之讥，然而这不过是文体上的变迁，其实论其初旨端在于讽谏。我们只须看一看《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就明白了。

讲到屈原的作品，本是名为“楚辞”，并未自命为“赋”的。用“赋”字题篇的是始于荀卿的《赋篇》。然而这是一个总题目，虽是分咏“礼”、“知”、“云”、“蚕”、“箴”五事，却不曾题作《礼赋》、《云赋》等名称。所以真正以“赋”为题的头一位，现在大概要算贾谊。（贾谊稍前的陆贾，《汉志》虽载他的赋三篇，今不可见。）但汉人对于屈、宋诸人的文章虽一面称他为《楚辞》（如《汉书·朱买臣传》云：“召见说《春秋》，言《楚辞》。”《王褒传》云：“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而一面则仍称为“赋”。试看《汉志》“诗赋略”，打头便是“屈原赋二十五篇”，与枚、马诸人同例；而下文叙论中也说屈原作赋以风（引已见前）。不特班固如此，《史记·屈原传》亦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又云：“乃作《怀沙》之赋。”《怀沙》是《楚辞·九章》的一篇，本无“赋”名，而太史公却明明称他为“赋”了。此外《汉书·贾谊传》及《地理志》，应劭《风俗通·六国篇》都说屈原作《离骚赋》；王充《论衡·案书篇》也说“赋象屈原、贾生”。可见汉人对于屈、宋的作品——《楚辞》是一律当作“赋”看待的。

汉人所以称《楚辞》为“赋”者，因为“辞”与“赋”的实质本无区别。试看《卜居》、《渔父》二篇本非骚体，也被列在《楚辞》集中；而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立赋》等篇，都是骚体的形式，却从来没有人目他们为“辞”的。即此一端，便知汉人称屈子的文为赋，不是没有根据的。

二 屈赋四大观念

现在要讲到本题了。屈原的辞赋是从何处来的呢？说来话长。照前人的说法，赋生于诗，但是屈原的文章自有他的来路，决不是如此简